

K 快言快语

炫耀富豪的高校难出大师

□ 正言

10 多年来,北大校友中诞生了 79 位亿万富豪。6 月 26 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上说,北大校友中的亿万富豪数量,已经连续 3 年居国内高校首位。(6 月 27 日《新京报》)

按照此前北京一教授放出的豪言:“当你 40 岁时,没有 4000 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我是学生”的教育理念,这些学子终于能够衣锦还校,拜见恩师了。而且从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的规格来看,校方对这些富豪也是极为赞赏的。

只是,如果以 1977 年恢复高考为分界点的话,不知以蔡公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之演说,以梅贻琦先生“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标准来看,北京大学虽说出了些许资本大鳄,但是可曾出过什么大师? 如果有,为什么钱学森曾多次追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钱老的追问,温家宝总理感慨道:“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 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对于不出大师久矣之怪状,有不少学者指出,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形态发生变迁的时下,有不少知识分子受拜金主义甚至犬儒文化、痞子文化的影响,甘于逃离神圣,摒弃价值,否定道德,追求所谓“我是俗人”。他们丧失人格,出卖原则,以无耻告别羞耻;他们逐利投机,蔑视理想,成为“有知识的恶棍”。在知识分子趋向于商业化和权贵化的当下,我们怎能指望出大师?

于是,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剽窃美国专家知名教材、清华大学教授刘辉公然学术造假的丑闻自然接二连三;高校盲目扩招、滥设专业、学费高涨,学子就业难、“新读书无用论”的新闻自然频出不断。于是,大学早已成了不是有大师之地而是大楼成群甚至藏污纳垢之所;高校自然已不是高尚高雅之处而几成唱高调、戴高帽、追逐高官厚禄的名利场。

遗憾的是,面对钱老的追问,面对总理的感慨,一些高校不是积极地学术研究上多下功夫,以出大师为己任,反而热衷于炫富炒作,如此这般,只怕离大师之梦是愈行愈远。

T 头条评论

谨防地方政府债务过重影响民生

□ 魏文彪

审计署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尘肇 27 日表示,总体看,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担尚未超出其偿债能力。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 27 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 2010 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 10.7 万亿元。(6 月 28 日《新京报》)

陈尘肇表示,从审计结果看,至 2010 年底,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 52.25%。如果按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全部转化为政府偿债责任计算,债务率为 70.45%。总体看,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担尚未超出其偿债能力。

笔者认为,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适度举债无可厚非,但是前提是政府背负的债务必须真正被完全用于公共事业与民生改善,如此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公众作为纳税人,事实上也有权要求地方政府公布自身债务详情,

我国超 97% 矿难由人为因素导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信息,而具体来说就是,

面对近期连续发生的多起较大瞒报、迟报煤矿伤亡事故,业界人士虽屡次痛定思痛,但对事故多发原因依然是众说纷纭。“实际上,在所有导致煤矿事故的直接原因中,由人为因素所导致的占比高达 97.67%。这个数据来源于对 1980—2000 年间 1203 起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案例的分析。”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红说。(6 月 28 日《中国经济周刊》)

我国超 97% 矿难由人为因素导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信息,而具体来说就是,

□ 郭立场

汕头市潮南区仙城镇七陂村是个 6000 多人的大村。十几年来,村里几任干部“忙”于非法卖地和贪污,疏于发展集体经济。今年 3 月,曾是七陂村民、但户籍已不在村里的周瑞丰当选村委会主任,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尝试以七陂村为试点,探索借助“外来村官”破解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的前“腐”后继难题。(6 月 28 日《南方农村报》)

村官是村民自治组织的“当家人”,但其权力却不容小觑。因其掌管着农村

公开政府举债投入的所有项目,让纳税人看看需要他们偿还的政府债务是否真正是全部被用于公共事业与民生改善,其中是否存在不当举债与浪费公众税款的举债行为。

另外,尽管有关方面表示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担尚未超出其偿债能力,但是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滚雪球般越增越大,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也将随之增大。例如,审计发现部分地区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不少地方政府将土地收入作为偿还债务的主要方式,这显然容易进一步加重部分地方的土地财政情结,从而抬高这些地方的地价与房价,损害民众居住领域的民生改善,从而损害到民生福祉。

其实,尽管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确有部分被用于直接的民生改善,但是其中相当部分实际上是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期达到拉动经济指标与 GDP 数据增长的目的。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入大、周期长,加之不少基础设施建设属于“费而不惠”的项目,这样一来部分地方政府就可能通过减少民生改善资金投入乃至进行不合理收费等有损民生行为,来达到更快偿还相关项目债务负担的目的。何况当前地方政府背负的债务中还有部分实际上是被用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这样一些因为建设劳民伤财项目背负的巨额债务,其偿还显然也会以改善民生资金受到挤压与

还是小煤矿来说,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矿主(管理者),在利益的刺激下,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铤而走险,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安全投入的增加会降低利润空间。因此,他们往往忽视安全生产问题,使煤矿和矿工超负荷运行。如此一来,超 97% 矿难由人为因素造成和八成以上矿难不可避免的刺目对比,不应引起社会的惊醒吗?

无数事故的沉痛教训都证明,在事故致因中人的因素是主要、主导因素。从近年我国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是人为因素,如违法开采、违章指挥、冒险作业、人员素质低下、对安全和生命麻木不仁有关。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是“解决问题、处理事故之后,事故依然发生”。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课题。

区,村干部腐败多集中在土地补偿款、企业改制等方面。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腐败则多发生在截留国家下拨款物、私分集体资产上。

不难看出,无论村官是大张旗鼓地捞,还是不着痕迹地侵占,都会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如果不深刻认识村官腐败的严重危害,不及时采取措施,有力的手段查处村官职务犯罪,将无异于助长村官冒险犯罪的意识,农村的长治久安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必须加强村官职务犯罪防治的建章立制,大力查处村官职务犯罪。

现实中出现的乡村权力异化腐败现象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把希望寄托在少数人身上的理想终归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治理村官腐败问题,除了采取对村官权力加以监督和约束外,最重要的就是要以村民权利制约村官权力。

“外来村官”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村治中的大量现实问题。七陂村数任村官前“腐”后继,根源在于权力不受监督和决策不公开、不透明。如果仅仅依靠“外来村官”非本村户籍的身份优势,而不彻底理顺村中的权力运行机制,村中重大决策不能履行民主程序、不能尊重多数村民意见,那么破解村官贪腐怪圈很可能会流于空谈。

村干部腐败的因素有很多,也很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乡村干部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的预期成本低,以及财务管理混乱等。调查显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家对农民税费的减免,当下,在经济发达的城乡接合部地

还是小煤矿来说,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矿主(管理者),在利益的刺激下,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铤而走险,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安全投入的增加会降低利润空间。因此,他们往往忽视安全生产问题,使煤矿和矿工超负荷运行。如此一来,超 97% 矿难由人为因素造成和八成以上矿难不可避免的刺目对比,不应引起社会的惊醒吗?

无数事故的沉痛教训都证明,在事故致因中人的因素是主要、主导因素。从近年我国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是人为因素,如违法开采、违章指挥、冒险作业、人员素质低下、对安全和生命麻木不仁有关。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是“解决问题、处理事故之后,事故依然发生”。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课题。

还是小煤矿来说,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矿主(管理者),在利益的刺激下,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铤而走险,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安全投入的增加会降低利润空间。因此,他们往往忽视安全生产问题,使煤矿和矿工超负荷运行。如此一来,超 97% 矿难由人为因素造成和八成以上矿难不可避免的刺目对比,不应引起社会的惊醒吗?

无数事故的沉痛教训都证明,在事故致因中人的因素是主要、主导因素。从近年我国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是人为因素,如违法开采、违章指挥、冒险作业、人员素质低下、对安全和生命麻木不仁有关。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是“解决问题、处理事故之后,事故依然发生”。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课题。

还是小煤矿来说,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矿主(管理者),在利益的刺激下,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铤而走险,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安全投入的增加会降低利润空间。因此,他们往往忽视安全生产问题,使煤矿和矿工超负荷运行。如此一来,超 97% 矿难由人为因素造成和八成以上矿难不可避免的刺目对比,不应引起社会的惊醒吗?

无数事故的沉痛教训都证明,在事故致因中人的因素是主要、主导因素。从近年我国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是人为因素,如违法开采、违章指挥、冒险作业、人员素质低下、对安全和生命麻木不仁有关。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是“解决问题、处理事故之后,事故依然发生”。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课题。

还是小煤矿来说,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矿主(管理者),在利益的刺激下,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铤而走险,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安全投入的增加会降低利润空间。因此,他们往往忽视安全生产问题,使煤矿和矿工超负荷运行。如此一来,超 97% 矿难由人为因素造成和八成以上矿难不可避免的刺目对比,不应引起社会的惊醒吗?

无数事故的沉痛教训都证明,在事故致因中人的因素是主要、主导因素。从近年我国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是人为因素,如违法开采、违章指挥、冒险作业、人员素质低下、对安全和生命麻木不仁有关。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是“解决问题、处理事故之后,事故依然发生”。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课题。

还是小煤矿来说,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矿主(管理者),在利益的刺激下,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铤而走险,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安全投入的增加会降低利润空间。因此,他们往往忽视安全生产问题,使煤矿和矿工超负荷运行。如此一来,超 97% 矿难由人为因素造成和八成以上矿难不可避免的刺目对比,不应引起社会的惊醒吗?

无数事故的沉痛教训都证明,在事故致因中人的因素是主要、主导因素。从近年我国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是人为因素,如违法开采、违章指挥、冒险作业、人员素质低下、对安全和生命麻木不仁有关。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是“解决问题、处理事故之后,事故依然发生”。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课题。

还是小煤矿来说,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矿主(管理者),在利益的刺激下,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铤而走险,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安全投入的增加会降低利润空间。因此,他们往往忽视安全生产问题,使煤矿和矿工超负荷运行。如此一来,超 97% 矿难由人为因素造成和八成以上矿难不可避免的刺目对比,不应引起社会的惊醒吗?

无数事故的沉痛教训都证明,在事故致因中人的因素是主要、主导因素。从近年我国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是人为因素,如违法开采、违章指挥、冒险作业、人员素质低下、对安全和生命麻木不仁有关。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是“解决问题、处理事故之后,事故依然发生”。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课题。

●/新书选介

《琼崖红色记忆》序言

■ 陈玉益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之际,《琼崖红色记忆》一书出版了,这是一件十分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是我们两代人为党的生日献上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厚礼。

这部书由一篇篇回忆文章汇总而成。它的作者,既有琼崖革命的亲历者和南下工作的老干部,也有琼崖革命前辈的后人,还有当年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大勇的后代等。他们以自身的独特视角,或记叙久远的经历,或叙述多年和父辈生活在一起的所见所闻所感,既再次印证了那段峥嵘岁月,那段历史,也弥补了以往一些文献资料所记载的不足,甚至第一次披露了好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这部书越发显得珍贵。

翻开这部“群英谱”,我们看到了琼崖革命先驱的身影,他们传播火种、发动群众,他们坚持信仰、大义凛然,他们视死如归、浩气长存。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用鲜活的生命去实践自我的理想,奏出了生活的最强音,组成了一幅幅丰富的、感人的、立体的、难于磨灭的历史画卷。

这些革命前辈,都本着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为着打破旧的社会桎梏,为着穷苦人民能够当家作主,为建设一个理想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在这部书中,随处可见到革命前辈们的动人身影,随处可感受到他们的高风亮节。读这样的书,我们至终会明白孤岛抗战为什么“23 年红旗不倒”,为什么广大勤劳苦人民会最终得到翻身解放;读这样的书,会让我们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来之不易,会更加珍惜美好的生活;读这样的书,我们也将始终相信,对于每一个读者来说,会是一次心灵的对话,会是一次精神世界的净化。

这些文章的作者,他们大多数已人过中年,在他们的情感世界里,早已经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淡定,但当他们回忆起峥嵘岁月,我们还是始终相信,这是历史的使命,贵无旁贷,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无愧于父辈,无愧于时代。

(作者原任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政协主席)

●/新书选介

《红色记忆》总序

■ 刘 栋

对历史无知的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可言;没有信仰的人,不可能拥有美好的理想,不可能胸怀崇高的情感,也就不可能担负起任何责任。用欲望文化代替历史教育,足以使一个国家的青年被腐蚀,使一个民族的希望被毁掉,使这个国家和民族被永世万代奴役!

鉴于此,我们呼唤历史,唤回那段属于上世纪的“红色”历史,唤回那段炮火硝烟、颠沛流离的历史,唤回那冲天的狼烟留下的悲壮回忆、岁月年轮积淀的斑驳痕迹。历史不应该被忽略,更不应该被遗忘,牢记那段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历史更是责任。为了那些不应该被忘却的记忆,为了那些不应该被丢弃的信念,于是就有了这卷《红色记忆》丛书。

曾记否,当草鞋与意志丈量出来的两万五千里穿越一个伟大民族五千年的荣辱兴衰,革

●/新书选介

回答一个世纪之间——代序《琼崖红色记忆》

■ 韩少功

欧洲进入工业化时代人口不足 1 亿;而眼下中国起码相当于那时的 10 个欧洲。美国经济起飞时每桶原油价格 1 美元左右,而当今中国正遭遇原油价格百倍以上的疯涨。可以比较的悬殊条件远不止于此。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乱、极贫、极弱的烂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 100 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 90 年,其经济总量连续超越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直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不久前预测:中国将在 5 年(按 PPP 计算)或 15 年(按 GDP 计算)后取代美国,实现经济总量全球第一。

环顾全世界一百多个曾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同类国家,这样的成功并不多见。其原因是 30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吗?当然是。但答案不会这样简单。因为非洲早就有市场经济,东欧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拉丁美洲、东南亚等早就开始与国际社会接轨,甚至全盘复制西方的宗教、政体、教育、文字以及土地私有制,但那里并未出现全方位的持续快进,甚至很多国家至今仍困于饥饿与战火。被誉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1949 年尚比中国略富,2010 年却是总量和人均 GDP 均只占中国的四分之一——两个人口大国应该说都有不错的发展,但差距不幸被一再拉大。印度的腐败指数,在西方有关机构的一再核查下也比中国难看许多。

这样看来,对中国式成功的原因探索,须延展到市场经济之外,须延伸到改革开放之前,即从“后 30 年”延伸到“前 30 年”,延伸到更为久远的 1921 或 1911。历史是一张无法剪辑的大网和一条无法切断的长河。百年苦斗之下国人的系列成果,包括民族主权独立这样的政治遗产,包括“两弹一星”、“全民扫盲”这样的经济和文化遗产,作为改革开放的基础打造和条件依托,作为中国特色的另一剖面,不应排除在视野之外。同样,百年苦斗之下国人的诸多学费,包括惨痛的“大跃进”和“文革”,作为改革开放的教训资源和校正依据,也不可讳言。这就像我一位朋友的比喻:一个人吃到第三个馒头的时候感觉自己饱了,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第一个、第二个馒头,你那第三个馒头的神力何在?

哪怕前两个馒头里夹杂了糟糠甚至泥沙。

可惜的是,近年来对历史的虚无化乃至妖魔化,在某些人那里几成时尚。他们清算革